

焦點評析

中國發展航空母艦對兩岸關係之影響

China's Aircraft Carrier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

張子揚 *Tzu-Yang Chang*

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一、前言

新華網於 100 年 4 月 6 日在首頁刊登中國首艘航母「瓦良格號」(Varyag) 改裝後的最新照片，接著，新華社又於 100 年 8 月 10 日報導該航空母艦已經展開海上試航，顯示中國已經正式進入航空母艦時代。

按照中國發展航母的進程，第一艘「瓦良格號」將先作為訓練用，另外兩艘自製航空母艦則正在上海長興島興建，根據外界估計，還需要 8-9 年才能服役，亦即中國航空母艦最快要到 2019 年才會對兩岸軍力平衡產生影響，屆時由中國發展航母所引發的對台戰略衝擊，是否會對兩岸關係產生影響，值得探討。本文將就中國發展航空母艦的可能戰力、意圖、數量與安全困境等因素加以分析。

二、中國航空母艦之戰力評估

回顧現有的文獻中，對中國航空母艦的戰力評估，主要有三種主張：第一種主張認為中國航空母艦的發展因為硬體及技術層次較低（傳統

而非核動力、65,000 噸中型航空母艦能搭載艦機數少、短場滑跳起飛、攔截索降落),以及各式配合艦載機能力有限(包括可能配置性能不如蘇愷-33 的殲十五戰機、又缺乏艦載定翼預警機與海基空中加油技術),因此整體的戰力有限,阻絕美國支援台灣的能力有限,對台灣的影響亦有限。

第二種主張認為中國航空母艦儘管戰力有限,特別是在遠洋作戰方面,但因為大陸距台灣近,航空母艦可以輕易獲得本土支援而克服前述的技術層次低的問題,因此對台灣的影響嚴重。

前述兩種主張均對中國航空母艦的遠洋戰力有所質疑,但對中國航空母艦在近海作戰的能力,是否能因本土支援方便而有所改善,尚無一致的看法,乃至對於中國航空母艦能否在台灣附近海域阻絕美國介入台灣問題,產生不同的判斷。

第三種主張則認為中國本土的戰機轟炸機可以直接威脅台灣(譬如殲 11B 戰機的作戰半徑為 1370 公里),不需要航空母艦作為攻擊平台,因此航空母艦本身的發展對台灣影響有限,但中國整體的軍事現代化卻強化了阻絕美國介入台海的能力,也惡化了兩岸軍力失衡的現況,使得台灣的防衛能力更加薄弱。

中國官方迄未表明準備建造航空母艦的數量,但解放軍將領曾對媒體表示,中國至少建造 3 航空母艦,一艘執勤用、一艘訓練用、另一艘在船塢維修。然而,若欲以一艘執勤的航空母艦達到前述多重意圖,在平時也許可以發揮作用,但在戰時則必然顧此失彼。因此若根據解放軍將領的說法,則中國發展航空母艦的象徵性與威望性的意義較大。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中國若欲達成前述多重意圖,勢必發展遠多於 3 艘航空母艦。目前可以確定的是 10 年內會有 3 艘航空母艦下水,待技術成熟及人員訓練養成後,第二個 10 年擴大生產規模亦不無可能。

三、中國發展航空母艦之意圖

除了實際戰力之外,如何詮釋中國發展航空母艦的意圖,亦會影響觀

察者對於中國發展航空母艦是否會影響兩岸關係的評估。一般均認為，中國發展航空母艦具有多重戰略意圖：（一）提升國際影響力；（二）成為區域霸權；（三）制衡美日軍力；（四）強化國防安全；（五）解決主權爭議；（六）保障原油供應線安全；（七）維護海洋資源利益。

除此之外，發展航空母艦對內還有提振人民士氣、強化民族尊嚴的效果，有助於鞏固中共統治的合法性。

中國發展航空母艦儘管符合其戰略意圖，但亦可能因此形成「安全困境」而適得其反：（一）加深與美國の間隙進而影響中美的合作關係，（二）導致區域軍備競賽並成為亞太區域各國的假想敵。

面對軍事現代化可能引發的安全困境問題，中國過去一直是以強化經濟合作關係緩和和安全困境，並且頗有成效，反映在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以及中美雙邊關係的持續改善上，再加上東協與中國自由貿易區正式成立，因此中國沒有理由為了擔心發展航空母艦產生安全困境，而改變軍事現代化的政策。

四、中國發展航空母艦對兩岸關係之可能影響

針對中國大陸發展航空母艦，台灣方面目前則以發展雄風三型超音速反艦飛彈因應，並且也已開始部署，第一階段包括 15 艘海軍戰艦，未來還將在海岸配置雄三機動發射車，射程達 600 公里。第一階段預計製造 120 枚，部署在海軍八艘 4000 噸級成功級巡防艦，以及七艘 500 噸級錦江級巡邏艦。但由於上述水面艦目標明顯、易受攻擊，亟需採購新一代柴電潛艦，方能有效嚇阻。

儘管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發展及其所代表的軍事現代化，使得台灣在軍事上處於中國大陸的相對弱勢，但台灣與美國的準同盟關係，以及美國與中國大陸的競合關係，使得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發展，受到美國因素的密切影響。前述所稱之美國因素，主要包含美國的政治、經濟、與

軍事等三個方面。政治方面涉及總統的意識型態、世界觀、全球戰略、國會導向及輿論民意；經濟方面涉及美國的財力及在全球的經濟地位；軍事方面涉及美國的武力及科技能力。政治方面的因素決定美國政府想做的事，經濟與軍事方面的因素決定美國政府能做的事。

中國發展航空母艦及其隱含的意義是為解決與周邊鄰國在東海及南海的主權爭議、制衡美國軍力、及在區域稱霸，這些意義早已引起了美國的重視，並且反映在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外交部門和國會均對中國的意圖感到憂心，咸認必須有所因應。例如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布萊爾認為 2009 年 3 月中國對美國「無懈號」海洋調查船的騷擾，是自 2001 年南海軍機擦撞事件以來，中美間最嚴重的軍事衝突。而美國副助理國防部長薛爾於 2009 年向國會美中經濟暨安全委員會報告時指出，美國強烈反對任何置美國船隻於危險並且明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於 2010 年 7 月在東協區域論壇更明白地指出，南海航行自由為美國利益之所在，美國願意協助南海主權相關爭議國家建立信心措施，以期訂定具有約束力的行為準則。但希拉蕊的陳述立即遭到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公開撰文抨擊，認為希拉蕊的言詞是在攻擊中國、挑釁中國、且撕裂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其目的是要圍堵中國和削弱中國的區域影響力。

上述事件顯示，中美雙方互視對方為東亞區域安全與和平的威脅，雙方均企圖因應和反制。中國為了反制美國航空母艦，部署了射程 400 公里的「鷹擊-62A」岸艦導彈、從俄羅斯引進「日炙」超音速反艦飛彈、以及發展了超靜音的 095 級核潛艦，並且還發展航空母艦。而美國為了因應中國發展航空母艦的威脅，除了加強軍事武力的反制外，現階段更重視反制中國發展航空母艦後對周邊國家產生的威望效應與西瓜效應。如美軍太平洋司令威勒德上將於 2011 年 4 月在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表示，根據他與東亞盟國的訪談，中國發展航空母艦已使美國在東亞的盟國認為那是中國軍力大幅提升的象徵。

在中國邁向區域強權的印象深植鄰國的情況下，美國欲扳回一城除需仰賴武力的強化外，更需加強同盟關係，確保第一島鏈的緊密連結，以鞏固其東亞霸主的地位於不墜。其中台灣是第一島鏈的重要一環，美國可藉由加強與台灣的安全關係，以宣示美國對維持東亞秩序現狀之決心，反之則美國可能失去其在此地區的領導地位。

然而，美國在經濟方面的壓力，特別是美國的流動性危機，以及中國作為美國最大債權國的事實，使得中美之間的槓桿產生了微妙的變化。美國除非必要，不願得罪中國。即使美國的長期目標是遏止中國在東亞地區稱霸，但美國卻不能事事與中國作對，特別是在中國視為核心利益的問題上，例如國家安全與主權等，美國採取了謹慎的態度，乃至在對台軍售問題上，不能滿足台灣的需求清單，凸顯出美國的兩難。亦即美國雖然身為世界超強，但在處理中國軍事現代化問題上仍需謹慎行事，既要反制中國，卻又不能撕破臉。這對台灣具有示範作用，亦即台灣對中國大陸航空母艦之發展，既要反制，卻也不能撕破臉，以免陷入既撕裂兩岸關係，又損害美台關係的窘境。

發展航空母艦只是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縮影，它的特殊意義在於中國似乎正從著重發展以小搏大的「不對稱作戰」戰略，轉變成兼顧對稱作戰武力，形成與美國的軍備競賽愈演愈烈之趨勢，且威脅美國的國家利益與美國在東亞的領導地位。

因為軍備競賽所形成的安全困境是否終究會迫使美中攤牌而形成新冷戰，端視三個因素的相互作用：美國的財力是否能夠負擔軍備競賽，美國的盟國是否願意支持美國維持的國際秩序，以及美國領導者如何看待中國的角色（戰略夥伴、負責任利益相關者抑或戰略競爭對手？）。

其中關鍵的因素是美國的財力，若是美國財力雄厚，續居世界領先地位，則美國不論視中國為戰略夥伴或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甚至是戰略競爭對手，美國的盟國均將願意支持美國所維持的國際秩序，但是兩岸關係

則將隨著美中關係的起伏而變動。當美中關係佳時，台灣受到美中雙方冷落；當美中關係轉惡時，台灣受到重視。

若是美國財政困難，無法負擔軍備競賽，則美國不能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否則會被對手拖垮。而美國的盟國則會企圖維持與美中的等距關係，棄守第一島鏈，並退回第二島鏈，將是美國不得不為的選擇，屆時東亞秩序均在中國掌控中，兩岸關係將進入攤牌階段，台灣的執政黨將決定兩岸走向和平統一或是戰爭征服。